

書 評 Reviews

艾佛瑞茲著，王慶蘋、華宇譯，《野蠻的上帝：自殺的人文研究》，臺北：心靈工坊，二〇〇六年。三六七頁。

曾 建 綱*

壹、前言

臺灣出版界已有許多探討自殺的著作，但以文學作品為分析主軸的專論，則少得可憐。雖然《野蠻的上帝：自殺的人文研究》之原著早在1971年即已問世，絕非嶄新之作，但中譯本能在35年後呈現在台灣讀者的眼前，其透徹的見解與巧妙的選材，仍能填補出版界在相關領域裡的一大窟窿。¹再者，近數十年來，臺灣的英文系／外文系，在教學及研究上都傾向當代文化批判／理論，文藝復興時期經典作家如鄧恩，史賓賽等，相較下已大受忽略。《野蠻的上帝：自殺的人文研究》中譯本之出現，可望喚起臺灣英國文學研究者對此塊領域的回顧與再思。此外，本文對本書中譯部份之分析與建議，期能提升西書中譯（特別是文學性極強者）之水準，並喚起大眾對此類譯本品質之重視。本文將側重於〈約翰鄧恩與文藝復興〉一章，分析其內容及中譯等層面。²

* 英國新堡大學（Newcastle University）英國文學博士，中國文化大學英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¹ 艾佛瑞茲著，王慶蘋、華宇譯，《野蠻的上帝：自殺的人文研究》（臺北：心靈工坊，2006年）。

² 《野蠻的上帝：自殺的人文研究》，頁189-214。

首先，就其內容而言，細心的讀者可一見作者艾佛瑞茲（Al Alvarez）對英國及歐陸文藝復興時期文學的用功，既廣且深。在這二十五頁的篇幅中，作者列舉了多位該時期的文化重鎮，如法國散文大家蒙田（Montaigne, 1533-1592）、義大利詩人但丁（Dante, 1265-1321）、英國史詩《仙后》（*The Faerie Queene*）作者史賓賽（Edmund Spenser, 1552-1599）、散文家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劇作家莎士比亞、及《憂鬱的剖析》（*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之作者波頓（Robert Burton, 1577-1640）。作者進一步援引並分析《仙后》第一卷中描寫「絕望」（Despair）引誘「紅十字騎士」（The Red Cross Knight，第一卷的男主角）尋死的段落（第九章，第四十節，4-9行），藉以說明對生命的「倦怠」（ennui）及尾隨而至的「求死念頭」（death-wish），頗能切合全書的主題，足見其選材之恰當。就英國文藝復興時期文學之推廣而言，作者舉《仙后》為例，其本身也有教育目的，因為若是撇開學院教授的研究，《仙后》恐怕與史賓賽一樣，早已遠離了一般大眾的「必讀書單」。英國詩人／批評家艾略特（T. S. Eliot, 1888-1965）就曾說，時至今日，除非酷好詩歌，或因人在杏壇，或為煮字療飢的批評家，非把《仙后》或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的長詩《序曲》（*The Prelude*）摸個清楚，否則何以為教。³而在台灣，即使在各大學英文系，史賓賽及《仙后》恐怕早已淪文學選集裡的一個「條目」。英國文學史的教授多半會「提及」這部巨著，但也會就此打住。此外，學院中也少有教授專攻史賓賽，因此想一探《仙后》之華胄也得憑運氣。本書舉《仙后》為例，對台灣早已失焦的英國文學教學，也起提醒之作用。

³ “There are only two reasons for reading the whole of *The Faerie Queen* or of Wordsworth’s *Prelude*. One is that you enjoy reading it: and to enjoy either of the poem is a very good mark. But if you don’t enjoy it, the only reason is that you are going to set up as a teacher of literature, or as a literary critic, and have *got* to know these poems”; see T. S. Eliot, “What Is Minor Poetry?”, in *On Poetry and Poet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1975), 38.

本書中〈約翰鄧恩與文藝復興〉一章以鄧恩(又譯鄧約翰, John Donne, 1572-1631)的散文 *Biathanatos* 為重點,譯者在譯注中對這個拗口的標題做了清楚的解釋,值得鼓勵。⁴但是,若將通篇讀畢,則不見譯者對鄧恩的生平加以淺說,這對學院以外人士有欠體貼。相較於同時期的莎士比亞(長鄧恩八歲)與培根(長鄧恩十歲),鄧恩在台灣知名度顯然黯淡許多。*Biathanatos*是本奇書,卻也極為晦澀,即使在英美學界,其受忽略的程度,大概可比《哈姆雷特》受重視的程度。雖然鄧恩在詩(二次)及證道詞(四次)中數度提到中國,但是*Biathanatos*則是第一次進到中文世界。⁵正因如此,本書中譯本的一大價值在於*Biathanatos*四百年來第一次現身於方塊字。雖然選譯的段落在原文中僅只開頭一段,但這段譯文已替英國文學的中文譯介補上漂亮且罕見的一筆,其歷史意義已超越了譯文的優劣。

貳、鄧恩生平簡述

鄧恩於 1572 年(明穆宗隆慶六年)生於倫敦麵包街(Bread Street),卒於 1631 年 3 月 31 日(明思宗崇禎四年),並於 4 月 3 日安葬於倫敦聖保羅大教堂(St. Paul's Cathedral)。隔年,他的紀念雕像就已立於大教堂內,雕像基座上還刻有鄧恩自己寫下的拉丁文墓誌銘。⁶時至今日,前往

⁴ 書名 *Biathanatos* 本應拼作 *Biaiothanatos* (Thanatos 乃希臘神話中的死神 Death), 意指「暴力致死」或「死於非命」(dying a violent death), 亦有 *Biothanatos* 等變體, 今已定於 *Biathanatos*。其書創作年代不明, 應不致早於 1606 年; 參見: Evelyn M. Simpson, *A Study of the Prose Works of John Donn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48), 159.

⁵ Homer Carroll Combs and Zay Rusk Sullens, eds., *A Concordance to the English Poems of John Donne* (Chicago: Packard and Company, 1940), 49; Troy D. Reeves, *Index to the Sermons of John Donne: Index to Proper Names* (Salzburg: Universität Salzburg, 1980), 51.

⁶ 此段墓誌銘英譯如下(譯者為 Francis Wrangham, 1769-1843): "JOHN DONNE, Doctor of Divinity, after various studies, pursued by him from his earliest years with assiduity and not without success, entered into Holy Orders, under the influence and impulse of the Divine

英倫的遊客仍可在大教堂裡看到這座面容枯槁、神情陰鬱的白色大理石像 (marble effigy)。鄧恩的父親與子同名，是倫敦有名的五金商，他在鄧恩五歲時就去世了。母親原名 Elizabeth Heywood，其父海伍德 (John Heywood, 1497-1580) 兼作警句 (epigram) 與幕間劇 (interlude)，其兄賈斯柏 (Jasper Heywood, 1553-98) 乃翻譯家，共譯有老塞內加 (Seneca the Elder) 的三部劇作，*Hercules Furens* (1561 年)、*Thyestes* (1560 年) 及 *Troas* (1559 年)。伊麗莎白的外祖父拉斯德 (John Rastell, 1475-1536) 也是當時著名的作家，而拉斯德之妻伊麗莎白·摩爾 (Elizabeth More) 正是《烏托邦》 (*Utopia*, 1516) 的作者湯馬斯·摩爾 (Sir Thomas More, 1478-1535) 的妹妹。由此看來，鄧恩的母系可說是家學淵源，他承繼了有形的先祖遺作與無形的文藝天賦，這在英國詩人中可說是僅此一家。

詩人的父親約翰和母親伊麗莎白共生四女二男，鄧恩排行老三卻是長子，十三歲時與弟弟亨利入牛津大學的 Hart Hall。鄧恩在 1592 年進入「林肯法學院」(Lincoln's Inn) 習法，但終其一生未曾正式投身法界。詩人在 1596 至 1597 年間多次參與海外探險，同行者包括伊麗莎白一世的寵臣埃塞克斯伯爵 (1566-1601，本名 Robert Devereux，1601 年 2 月 25 日因叛國罪遭斬首) 和羅利爵士 (Sir Walter Raleigh, 1552-1618)。數次探險中，鄧恩曾遠征至西班牙西南角的加地斯 (Cadiz，又稱 Cales) 及北大西洋上的葡屬亞速群島 (The Azores)。結束探險後 (1597-98)，詩人榮任掌璽大臣 (Lord Keeper of The Great Seal) Sir Thomas Egerton 的秘書，仕途一片大好。1601 年 11 月鄧恩與大臣喬治摩爾 (Sir George More) 未滿十七歲

Spirit and by the advice and exhortation of King James, in the year of his Saviour 1614, and of his own age 42. Having been invested with the Deanery of this Church, November 27, 1621, he was stripped of it by Death on the last day of March 1631: and here, though set in dust, he beholdeth Him Whose name is the Rising.” 參見：Edmund Gosse,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John Donne Dean of St. Paul's*, Vol. 2 (Gloucester, Massachusetts: Peter Smith, 1959), 282.

的愛女 Anne More 秘密結婚，引起眾怒，喬治爵士向鄧恩的老闆 Egerton（Ann 的叔叔）施壓，讓鄧恩丟了秘書工作，並把詩人丟入弗利特監獄（Fleet prison）裏蹲了二個月。自 1601 年秘密結婚起，到 1615 年授命為聖保羅大教堂執事止，詩人與妻子 Ann 攜手度過了近 15 年的苦日子，期間夫妻倆還肩負九個孩子的教養及一位早夭兒（排行第七）帶來的悲痛。這 15 年中詩人多次求官，卻也屢遭冷眼，其事業要到 1621 年才開始好轉。這一年 11 月他被任命為聖保羅大教堂主教（Dean），其精緻機巧的證道詞足可媲美當代大師藍斯洛·安德魯斯（Lancelot Andrewes, 1555-1626），其價值也早已超越了宗教層面而晉升為文學傑作。詩人任職主教直至 1631 年 3 月死於任上為止，長達 10 年。鄧恩的詩作在死後 2 年（1633 年）才正式出版，1650 年長子約翰整理父親的遺作，另外出版了一個集子。

參、本書之譯文

首先，作者艾佛瑞茲的原標題為 *The Savage God: A Study of Suicide*，譯者卻奉送了「人文」二字，以強調其有別於諸多以自殺為醫學或心理學題材的研究。譯者「巧立名目」，竟達「市場區隔」之效，雖不「信」，卻可「達」。其次，譯者將 *Biathanatos* 譯做《論自殺》，可待改良，若能譯為《自殺辯》則更能切中鄧恩的主旨，因為鄧恩並非「議論」自殺，而是為其辯護。在西方宗教傳統中，正如艾佛瑞茲所說，「它是至惡的原罪，是一項恐怖的行為，是道德憎惡的對象」⁷。這種對自殺者幾近天譴的責難，在西方可見諸於但丁《神曲·地獄篇》。因此，譯者將 *Biathanatos* 譯為《論自殺》有失鄧恩那種好辯的反骨特色。更何況，從鄧恩的整體文字風格來看，他在詩中的「反佩脫拉克作風」（anti-Petrarchanism）及「反西賽羅作風」（anti-Ciceronianism）也充分說明他處處與時俗對立，進而譏諷的

⁷ 《野蠻的上帝：自殺的人文研究》，頁 181。